

# 1923年孫中山致函 真光中學校祖那夏理辨析

程強強\* 夏泉\*\*

那夏理是清末民初美北長老會來華傳道的少數女傳教士與教會教育家之一，係廣州真光中學校祖。在華期間，她為廣東近代女子教育事業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1923年在其離華歸美休養之際，孫中山先生委託秘書陳友仁致函，感謝她為廣東近代女子教育事業所做的積極貢獻。這封函件是由那夏理後人提供之新發現的研究孫中山文獻。對於孫中山致函那夏理一事，近年來出版的有關那夏理的論著大都語焉不詳，或存有歧義。有鑑於此，本文擬着重圍繞這則新資料加以辨析。

新近筆者在搜集美國來華傳教士那夏理文獻的過程中，發現了一則有關孫中山晚年的新資料：1923年孫中山委託其秘書陳友仁致那夏理的函件。這則資料在《孫中山年譜長編》、《孫中山全集》、《國父全集》等現有研究孫中山的主要文獻中均未有提及。這封由那夏理後人提供、現藏於香港真光中學的函件，對於研究孫中山晚年的活動不無裨益。

那夏理（Harriet Newell Noyes, 1844-1924），美北長老會在廣東佈道的少數女傳教士之一。1867年，奉美北長老會海外傳道會之命來華傳教，於1868年1月14日抵達廣州。在華傳教期間，她目睹中國女子的悲慘境遇，遂向美北長老會倡議興辦一所女子寄宿學校。在美北長老會海外婦女傳道會的協助下，她實現了興學目標，1872年在廣州創辦“真光書院”<sup>(1)</sup>，為眾多貧困家庭的女子提供了接受學校教育的機會。她還以真光學校為

中心，開辦義學和國民學校，舉辦慈善事業，宣導女子放足，抵制封建包辦婚姻，促進了近代廣東女子思想的解放和自主意識的提昇。正因為如此，那夏理在近代廣東女子教育史和婦女解放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儘管那夏理在清末民初的廣東教育史上地位如此重要，但隨着時間的流逝，後人對其所知甚少。不過，值得慶幸的是，她所創辦且延續至今的分佈在穗港等地的七所真光學校仍為今人們所津津樂道。然而在出版的有關那夏理的書籍資料中，一些史實多有歧義，尤其對1923年孫中山致函那夏理一事更是莫衷一是。譬如，《南風窗》2010年第21期刊載的何明星先生的文章〈從傳教士教育家到紅色書店的掌門——一個美國家族四代人與中國的一個半世紀〉一文就這樣描述：“1923年5月她返回美國，孫中山給她發去信函，感謝她為中國婦女教育所做的貢獻”；而

\*程強強，暨南大學2011屆歷史學碩士；\*\*夏泉，暨南大學歷史學博士生導師，研究員。

REPUBLIC OF CHINA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CANTON.

May 16, 1923

Miss H.N.Noyes &  
Miss E.M.Butler  
"True Light" Seminary  
Canton

Dear Misses Noyes & Butler,

On the eve of your departure for America, Dr.Sun Yat-sen, on behalf of the Cantonese people, desires to express his appreciation of the exceptional service which you have jointly rendered in the cause of education here. It seems to him that you leave behind an enduring memorial in the 6000 pupils who have been trained at the "True Light" Seminary. He wishes you a pleasant voyage Home.

Yours very faithfully

*Eugene Chen*

Secretary to Dr.Sun Yat-sen

李韋玲女士2008年10月16日在《香港經濟日報》上撰寫的專欄文章〈立志〉中則提及：“在臺上講話結束前，我希望有個像樣的結論，腦海裡忽然浮現那夏理女士退休回美國前，孫中山先生親自去信多謝她對中國教育的貢獻。”對於這一事件的敘述，上述兩文均存在歧義。筆者擬圍繞這則新發現的孫中山文獻，作相關史實考辨，以求教於方家。

### 致函者是孫中山的秘書陳友仁

由那夏理後人所提供的現藏於香港真光中學、1923年5月16日那夏理女士離華返美時收到的英文信函<sup>(2)</sup>令中文譯文(筆者翻譯)如下：

尊敬的那夏理女士、畢美意女士<sup>(3)</sup>：

在你們離開廣州前往美國前夕，孫中山先生代表廣東人民對你們為廣東女子教育事業所做的傑出貢獻表示感謝。在孫先生看來，你們給在真光學校受過教育的六千多名學生留下了難以磨滅的記憶。在此，他謹祝你們歸途愉快！

函件顯示，落款人不是孫中山，而是他的秘書“Eugene Chen”。據相關史料考證，“Eugene Chen”是著名的國民黨左派領袖陳友仁的英文名字。陳元珍在《民國外交強人陳友仁——一個家族的傳奇》記載：“陳友仁(Eugene Chen)，祖籍廣東順德，1878年出生於西印度群島的特立尼達南部的聖費爾南多鎮，從小接受英國教育。1912年初，他為回應辛亥革命，回國効力，先後當過交通部的法律顧問和英文《北京每日新聞》的編輯，隨後創辦了英文《京報》。陳友仁政治觀點鮮明，文筆犀利，他撰寫了許多抨擊北洋政府、褒揚南方政權的評論性文章，由此獲得了孫中山

的好感。1917年，英文《京報》因抨擊北洋軍閥而被迫停刊，陳友仁隨即離京南下追隨孫中山，從此伴隨其左右，成為其晚年不可或缺的助手。陳友仁不僅是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設計者，而且還參與了他晚年的許多重要決策和活動。他常常飾演孫中山代言人的角色，被譽為‘孫中山先生最親密的朋友’。”該書還記載，自1917-1925年孫中山逝世，陳友仁一直伴隨左右，成為其最親密的助手。對此，錢玉莉撰寫的〈孫中山陳友仁關係初探〉(《黨史研究與教學》，2002年第6期)中也提及：“陳友仁(尤金·陳)，英文名 Eugene Chen”，“是1917年後才跟隨孫中山的”，“由於他對時事有敏銳的洞察力，具有高超的英語水準，並且熟知英國等國家的法律和制度，因此他加盟後即被委於重任，並一直伴隨其左右。”此外，《申報》1944年5月23日刊載的顏惠慶《簡述陳友仁生平》<sup>(4)</sup>中亦寫道：“綜觀先生之生平，與孫總理有極為相似之處。”顏氏一文道出了孫陳關係親密的個中原因，他認為兩人相同的政治抱負是陳友仁1917年之後緊隨孫中山左右、直至孫先生逝世後仍執著地堅持“三大政策”的重要原因。函件顯示，該函發出的時間是1923年5月16日，而通過相關史料的比對，可以確定陳友仁當時確實是孫中山的秘書。綜合以上史料考證，可以準確地判斷出1923年5月16日給那夏理女士發去信函的是時任孫中山秘書的陳友仁先生。

### 孫中山為甚麼未親自致函

孫中山為甚麼不是親自去函，而是委託秘書代為辦理？對這一問題可以從陳錫祺主編的《孫中山年譜長編》和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輯的《國父全集》中找到答案。《孫中山年譜長編》

記載：“1923年5月16日，孫中山赴東江巡視並慰勞各軍。”<sup>(5)</sup>查閱史料可以得知，這一年4月16日中央直轄桂軍第一路總司令沈鴻英叛變，所部由廣州白雲山進窺廣州城區。沈叛變後，孫中山親自督師，偕楊希閔率滇軍抵禦。同年5-6月，為討伐叛軍沈鴻英部，孫中山先後赴清遠縣源潭、三水縣河口、英德、博羅、惠州、虎門等地巡視和勞軍。<sup>(6)</sup>這些史實，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纂的《國父全集》（第四冊）中可以看到當時的電文資料。<sup>(7)</sup>顯然，當1923年5月16日真光中學校祖那夏理準備回國休養時，孫中山正奔赴在外，為討伐逆軍進行巡視和勞軍，因此去函一事祇好委託秘書陳友仁辦理。

### 孫中山為甚麼致函那夏理

值得思考的是，在軍務繁忙的情況下，孫中山依然不忘委託陳友仁向那夏理發去專函，感謝她為廣東女子教育事業所做的貢獻。那麼，那夏理對廣東女子教育事業做出了怎樣的貢獻，引起孫先生如此重視？據那夏理回憶錄《支那地之一曙光》以及真光第二任校長劉心慈<sup>(8)</sup>回憶錄《真光光榮簡史》中記載：

1872年，那夏理在廣州沙基的金利埠[即現在的六二三路]購地建校，取名為“真光書院”。

劉心慈在其回憶錄中稱“真光書院”的創辦，“洵開吾粵女子教育之先河”<sup>(9)</sup>。因為，在封建社會，中國祇有女教，沒有女學。女子足不出戶，祇是在家裡聘請教師，進行家庭教育，而且學習內容也多是歷代教育女子的幾本典籍，如班昭的《女誡》、劉向的《列女傳》等。學習的目的祇是希望女子能夠通曉持家之道、相夫教子

之法，以成為賢妻良母、貞女節婦，而且這種家庭教育祇是局限於富有之家，貧窮人家的女子是沒錢讀書識字的。不可否認，傳播基督教福音是那夏理創辦真光書院的最初目的。真光在開辦之初，宗教課程佔據教學內容的大部分。然而，在辦學過程中，為適應中國形勢的發展變化以及應對同類學校的競爭，那夏理不斷提高辦學層次、辦學水準，注意培養優秀的師資，引進新式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對廣東近代女學的發展做出了許多開創性的貢獻，為國人自辦女學提供了良好示範。那夏理創辦真光書院，首開廣東女學風氣之先，打破女子無學校教育的落後狀態，使女子邁出從走出閨閣。接受教育到服務社會的一大步，為廣東近代女子教育的轉型奠定基礎，並為之後開辦的廣東女校培養了師資和人材，推進了廣東女子教育近代化的進程。

在那夏理為真光服務的五十多年中，她始終恪守着“行勝於言，言而不行，不若不言”的人生信條，並通過其畢生努力，為真光乃至廣東近代女子教育事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為眾多真光女兒樹立了光輝的典範。在辦學過程中，她由注重宗教教育向注重世俗教育轉變，並把辦學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由此也完成了從傳教士到教會教育家的角色轉變。她還以真光為中心設立義學和國民學校，積極提倡婚姻自由，勸戒纏足，對中國的陳規陋習發起挑戰，促進了女子思想的解放和獨立意識的提昇。她們紛紛衝破舊禮教所設置的藩籬，走出家庭，進入學校，畢業後積極投身於社會生活，成為變革社會的新興力量。那夏理創辦真光書院，不僅開闢了女性的視野，而且也使她們呼吸到新鮮自由的空氣，汲取到智慧的營養，成為具有文化知識的新女性。

孫中山一向重視婦女的人材培養工作，十分關心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甚至把爭取婦女的選舉

權、參政權作為民權主義的一項重要內容。為此，他還專門撥款創辦了女子政法學校<sup>(10)</sup>；同時，他寄厚望於中國婦女，希望她們能“發奮有為”、“力行無倦”、“以光吾國”<sup>(11)</sup>。1912年5月6日，他曾到廣東女子師範第二學校演講，宣講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他說：

中國人數四萬萬人，此四萬萬人皆應受教育。中國女子雖有兩萬萬，惟於教育一道，向來多不注意，故有學問者甚少。處於今日，自應以提倡女子教育為最重要之事。<sup>(12)</sup>

在他看來，教育既興，然後女界可望平權。所以，他非常關心中國的女子教育事業，殷切期望中國能造就大批“女界人材”。因此，為廣東近代女子教育事業和婦女解放事業做出傑出貢獻的那夏理女士得到孫中山的重視和贊揚亦在情理之中。

綜上，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1923年孫中山確實給那夏理女士發去過感謝函，但由於他外出督師軍務繁忙，沒辦法親自致函，祇好委託陳友仁辦理。

#### 【註】

- (1) 該校是一所教會女子寄宿學校，專門招收女生，是廣東乃至南中國境內較早創辦的女子教會學校之一。1890年真光書院改名為真光學堂。1912年按照教育部規定，又改名為真光學校。至1916年真光已發展為一所頗具規模的學校，設有初小、高小、婦女班、師範、研經等部。1917年，那夏理又在芳村白鶴洞增辦中學，即現在的真光中學，是當今分佈在穗港等地七所真光學校的前身。
- (2) 英文函件全文：“Dear Misses Noyes & Butler, On the eve of your departure for America, Dr. Sun Yat-sen, on behalf of the Cantonese people, desires to express his

appreciation of the exceptional service which you have jointly rendered in the cause of education here. It seems to him that you leave behind an enduring memorial in the 6000 pupils who have been trained at the “Ture Light” seminary. He wishes you a pleasant voyage home. Yours very faithfully Eugene Chen, Secretary to Dr. Sun Yat-sen.

- (3) 畢美意女士(1845-1937)，美國人，1881年奉美長老會遣派來華，任職於真光學校，協助那夏理女士開展校務工作，1923年5月和那夏理一同返美。她在美國大學接受師範教育，畢生盡瘁於教會事工。其父為當地牧師，受其父影響，畢美意女士從小便立志獻身於基督教傳教事業。大學畢業後，在美供職十三年，隨後來華。在真光服務期間，看到學校周圍男童沒有接受教育的地方，乃向美國朋友籌款，在真光對門創立學校，命名為“培基學校”，該校學生多為教徒家庭子弟。
- (4) 該文是顏惠慶於1944年5月22日在陳友仁葬禮上所致的悼辭，對陳友仁的生平作了簡要的介紹。參見《申報》，1944年5月23日第3版。
- (5) (6)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下冊，中華書局，1990年。頁1630；頁1613-1650。
- (7)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國父全集》第四冊，臺北，正中書局，1973年，頁657。
- (8) 劉心慈(1871-1946)，廣東香山人。母親為長老二支會第一任女執事，父親為該會第一任宣講師，自幼受家庭宗教教育薰陶，六歲時便能背誦使徒行傳多章。1878年入真光書院就讀，1884年擔任真光教員，1919年成為真光第二任校長。在真光服務服務六十載，訓迪學子，默化潛移，示之於軌範，感之於靈力，受其教化者不知凡幾，為真光女校的發展傾注了很多心血。晚年著有《真光光榮簡史》一書，對真光的歷史作了比較詳細的論述。
- (9) 劉心慈：《真光光榮簡史》，香港：何陰棠私人出版，1972年，頁2。
- (10) (11) (12) 周秉恒：〈孫中山先生重視造就婦女人材〉(原載《團結報》1983年3月10日)，《回憶與紀念——紀念孫中山先生文章選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6年。頁272；頁272；頁273。